

1987年以来改革的社会心理 环境的调查分析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社会舆论调查室

1987年,针对改革中的社会心理,我们进行了8次大规模调查。这些调查是形成本报告的基础。

为本报告提供主要数据的两项大规模调查,其样本是以全国353个市12258.47万市区非农人口中18岁以上者为总体,严格按照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的。在调查中我们使用了同样的问卷或同样的题器和量表进行定期调查,使几次调查的数据和结论具有了可比性。

一、改革的社会心理环境已进入新阶段

根据我们对1984年以来的社会心理的连续观测和综合分析,我国处于变革时期的社会心理的变动主要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4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后至1985年第一季度以前。这一时期社会心理的主要特征是,在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的过程中,城市居民的改革热情高涨,对改革抱有的收入预期过高,而对可能带来的风险心理准备不足。造成这种心理状态的原因,一方面是城市居民耳闻目睹了改革给农村带来的可喜变化,特别是农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昔日不得温饱的农民,在短短几年间,不仅温饱有余,而且有一部分人开始富裕起来,这对人们是实实在在的鼓舞。另一方面是宣传给人们的影响,为了强调改革的神奇功效,片面宣传“暴富”的实例,而很少提到农村包产到户后,农民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在整个生产经营活动中所要承担的各种风险,以及一些承包户、专业户的亏损、破产。正是在也有可能当“万元户”的憧憬中,当时使“改革=立即提高收入(否则就不叫改革)”的公式深入人心。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期待着改革,对改革抱着许多美妙的幻想,而绝少想到改革的过程中也会有新的烦恼、甚至新的痛苦。

第二阶段,1985年第二季度至1985年底。以农副产品价格放开为主的价格改革实施前后,先是抢购、挤兑风此起彼伏,继而面对物价上涨、价格波动以及物价管理上的一些漏洞,怨声载道,公众不满情绪明显上升。从这时起,我国现阶段社会心理结构最显著的特征——坚决支持改革的积极心理特质与高依赖性、低风险承受能力的保守心理特质并存——开始突出地表现出来。但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在“大锅饭”体制下生活惯了的我国城市居民,艰难地经历了市场经济生活的锻炼,逐步接受了从价格冻结到价格放开的变化,适应能力有所提高。这一时期人们对改革的理解和支持也已不同于改革初始阶段,仅仅源于多年来累积的改革愿望,而已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改革本身的效果。效果一: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1985年的两次调查,分别有84.5%和73.4%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因此,这一阶段不管人们是否有这样或那样的怨言,但对“近几年日子好过了”却普遍表示赞

同。效果二：消费者主权地位的上升。人们在价格改革的各种感受中，最强烈的莫过于对市场活跃、商品丰富的满足。从有钱买不到东西到可以有选择地买到自己喜爱的东西，人民群众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改革的这两大效果带来了很好的社会心理收益，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时人们对物价上涨的不满。

第三阶段，1985年底至1987年初。这一时期社会心理的特点，一是群众不满的方面在明显增加，由过去集中于物价上涨，扩大到以权谋私、任人唯亲、法制不健全、不能自由选择职业、收入不平等等方面。二是不满焦点已从物价上涨转移到机会不均等上，1986年2月的调查表明，有51.8%的人认为改革给每个人带来的机会是不均等的，18.9%的人持中间态度，认为机会均等的只占29.3%。三是人们对改革的期望已不再集中于收入一点。参与期望（参与社会生活的政治要求）、社会期望（提高社会地位或实现自我的要求），机会期望（获得更多自由择业和公平竞争机会的要求）等等，都已成为改革期望的重要内容。四是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利益格局的变化，不同的社会群体在改革期望、承受能力和改革态度上的差异日趋显著。

到1987年年初以前，改革的社会心理环境尽管经历了以上三个阶段的演变，但几个最基本的特征却是共同的。

第一，这一时期人们对改革的热情始终在不断高涨。这一点突出的表现是人们对改革的要求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到1986年底，根据对38个城市2451人的调查，68.1%的人表示“我希望改革能给我带来更多的挣钱机会”；86.2%的人认为“改革就应该使我们能较快地提高收入”；91.9%的人说“我希望改革后能使人们凭本事挣钱”；80.1%的人表示“我希望通过改革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86.2%的人表示“进一步的改革应该给我带来更多的发言权。”绝大多数人要求一致，希望一致。这种高涨的改革热情发展到1986年底，1987年初达到了顶点，甚至导致某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和以某些幻想为参照系的不满以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这期间由部分青年学生掀起的学潮集中地代表了这种强烈的情绪。

第二，这一时期人们的种种不满主要集中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上，而且，对造成这些令人不满意的现象的原因，人们仍然习惯地归结到政府和当事人的身上。例如：对物价上涨不满，人们最直接的反应是要求政府出面限价或多发价格补贴；对调动工作中的困难，人们的不满矛头通常指向本单位或上级单位的人事干部；对服务态度的不满，人们更多地指责各类服务人员的个人品质或自认晦气，等等。甚至有不少人简单地归因于改革，48.9%的人抱怨“改革改来改去，不搞歪门邪道的人总是吃亏”。造成人们这种认识的深刻根源，是过去几十年吃大锅饭的经济生活以及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再加上长期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理解和片面宣传，人们习惯于把自己当做“国家”的人，习惯于被动地服从，习惯于人治，经过几年改革，一切依赖国家、事事要靠组织的观念，幸福要等别人给予，困难要等领导解决，向国家索取一切的观念仍然广泛存在。缺少主动性、进取性的结果，是对不满归因的简单化，对改革的认识停留在表层，难以深入。

第三，这一时期社会心理的波动起伏较少，也比较清晰，不同社会群体对改革认识上的差异、情绪上的对立、行为上的矛盾已经出现，但尚不足以造成重大的社会问题。首先，前几年的各项重大改革都是针对旧体制的明显弊端进行的（例如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僵硬的固定工制度等）。这些改革措施都是有组织、分阶段地实施的，准备工作充分，可控性也较强（例如1985年进行以农副产品放开为主的价格改革，1986年对新增劳动力实行合同工制等）。又由于执行这些新的政策、法规的各种结果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例如这些改革措施同旧体

制的冲突，给不同人带来的各种利益或损失等）。因此，这一时期的社会心理主要是依这些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顺序而变动的，而且这种变动呈现出有规则、可预测、全社会基本一致的明显特点（例如1985年人们在对市场供应丰富感到欣喜的同时，出现对物价上涨的恐慌心理；1986年在人们表达希望自由选择职业的背后，流露出对失去终身就业保障的担忧；以及1986年底通过骤然形成的社会舆论，提出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要求等）。其次，前几年的改革尚没有改变旧体制的基本结构，特别是在与人关系密切的方面，基本还没大动。例如，在职工收入分配上，保持了原有的工资制度，只是在新增收入（奖金部分）上进行了改革；再如，在劳动制度上，明文规定实行合同工制不包括原有固定工，就业方式上的改革只对新增劳动力有效，等等。这种稳妥的改革保持了绝大多数人的既得利益，不同社会群体也只是在新增利益上存在着方向上和数量上的差异，利益绝对受损的只是极少数。这种状况反映到社会心理上，除了波动点一致、同步以外，就是波动的强度较弱、幅度较小。因而这一时期出现社会失稳、社会动乱的可能性极小。

到1987年，社会心理发生了较大的变动，以上三个主要特征的消失，标志着改革的社会心理环境已经开始进入新阶段。

二、新阶段社会心理的主要特征

1. 人们对改革的认识已趋于理性化

1987年，对改革的社会态度发生了一些明显的改变。首先，人们已不再用一种理想主义的眼光看待改革，不少人在改革初期所持有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开始破灭。幻想一，认为改革能够很快就大功告成，这曾经是许多人衷心的期待。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985年的一次调查中，75.3%的人表示“只要改革能改好，我们生活水平暂时低一点也行。”但实践证明，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新体制代替旧体制，从而使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物质财富更大丰富都还有待时日。幻想二，认为改革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好处，例如增加收入、市场丰富、可以自由地选择职业等，但几年来的社会现实告诉人们，伴着所有这些已经得到和还没有得到的好处，是相应的风险，例如收入不稳定、物价波动、甚至有可能暂时失业等。幻想三，认为既然改革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那么每一项重大改革措施都会得到人民群众一致支持的。然而事实上，迄今为止的任何一项改革都没有得到过人们百分之百的支持，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有时自己支持的某项改革，却遭到另外一些人的反对，有时自己担心会实施某项改革，而另外一些人却在殷切地期望着。类似的矛盾和冲突始终存在。正是这些幻想的破灭，引起了热情降温，1987年7月在对2415人的调查中，我们请被调查者对改革以来9方面社会状况所发生的变化进行评价，结果对“人民政治热情”是否降低的评价居倒数第二位，综合评分2.13，仅略高于对“干群关系”的评价（综合评分2.11）。热情降温的结果，使人们能够冷静地、更加客观地看待改革：1987年5月和10月，我们在40个城市中进行了两次定期调查，对个人生活、社会生活、现行政策和制度等48个方面进行了满意度的测量，结果发现，前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在48个测量指标中，有43个呈下降趋势。但就在人们对现状不满上升的同时，对改革的评价却没有相应降低，两次调查结果表明，对改革的综合评价得分甚至有微弱的上升——第一次测量综合评分为39.94，第二次测量综合评分为40.03（改革评价量表的中位值为36，综合评分超过36，表明对改革持积极肯定态度）。人们开始以现实的、理性的态度看待改革还表现在对改革速度的评价上：

表 1

问题：您认为近一年来的改革速度是：

调 查 日 期	回 答		
	快 了	适 中	慢 了
1986 年 2 月	33.1	27.2	39.7
1987 年 5 月	26.9	46.2	26.9
1987 年 10 月	28.1	45.1	26.8

资料来源：1986年2月对20个城市2555人的问卷调查。1987年5月对40个城市2576人的问卷调查。1987年10月对40个城市2401人的问卷调查。

1987年与1986年相比，认为改革速度适中的人数明显增多，持相反评价的人数相应减少。而且，对改革速度的这种认识在1987年上半年和下半年之间变化很小，保持基本稳定。

其次，人们已越来越与切身利益、眼前利益紧密联系地看待改革。1987年5月调查，人们根据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按强弱程度对各方面的需求排列顺序是：第一位，有保障的生活，综合评分2.705；第二位，增加个人收入，综合评分2.367；第三位，改善住房条件，综合评分2.111。1987年10月调查，按需求强弱排的顺序没变，前三位的需求强度还有所增加（前三位的综合评分分别为2.738，2.565和2.272）。两次调查均表明，个人物质需求和安全需求的社会平均强度远高于个人社会需求（如提高社会地位、发挥才能、对公共事务争取更多的发言权等）。同时，人们对切身利益得失多寡的主观判定直接影响着他们对改革的态度。这种主观判定是在人们与周围人进行的社会比较中得出的，因而每个人都可以在收入水平、社会地位等方面做出自己属于较高、中等、较低的主观判断。调查表明，这种主观判定与对改革态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因果关系：

表 2

调 查 日 期	改革综合评分 \ 收入水平		
	较 高	中 等	较 低
1987 年 5 月	44.76	41.19	38.10
1987 年 10 月	43.38	41.45	38.24

表 3

调 查 日 期	改革综合评分 \ 社会地位		
	较 高	中 等	必 低
1987 年 5 月	43.22	40.71	36.46
1987 年 10 月	44.43	40.73	37.32

人们越是认为自己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比周围的人高，对改革的态度就越是积极肯定。

越来越多的人更多地从“实惠”的角度看待改革，这种状况与改革初期相比是一显著的变化（改革初期人们对改革的态度中，情感因素起着更多的作用，如对旧体制和长期贫困生活的厌恶，以及对未来富裕生活的美好想象等）。这种变化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改革的社会心理环境变动的规律，使得社会能够根据利益原则去对人们的情绪和行为进行调节；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人们对改革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短期利益受损（包括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的容忍极限将会越来越低，说明这一点的最近的例证是1987年底人们对猪肉恢复凭票

限量供应的态度。1987年猪肉严重紧缺，一些大城市不得不恢复票证，这无疑只是一项暂时的措施，但根据我们当时对北京、天津1152名家庭主妇的调查，由于这项措施至少使凭票供应的猪肉在价格上保持了稳定，符合人们的眼前利益，就得到了大多数人不加思索的支持，甚至有77.1%的人表示愿意在今后的猪肉供应上继续实行“凭票供应、价格稳定但供应限量”的办法，而不愿意“敞开供应、价格波动但不限量”。这种态度与改革前和改革初期人们对长期实行票证的强烈反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2. 人们的不满和改革要求已从现象层次深入到制度层次

1987年初以前，人们的不满更多地指向周围的一些社会现象，迫切要求改变的往往也是这些现象本身。1987年初以来，则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不满指向我国的各项现行制度，表示不满的人数比例比较高的有住房分配制度、工资制度、人事调动制度、干部选拔制度、公费医疗制度、固定工制度等，下半年与上半年比，不满的人数还有所上升：

表 4

现行制度	调查日期		10月与5月比(±)
	%	日期	
住房分配制度	49.0	1987年5月	+3.7
工资制度	36.0	1987年10月	+2.6
人事调动制度	33.8		+3.5
干部选拔制度	33.5		+2.9
公费医疗制度	22.0		+2.3
固定工制度	21.0		-1.0

在对这些制度表示不满的人中，绝大多数人要求加快改革，把自己不满的原因归结为改革改得不够，认为固定工制度改得不够的占92.3%，认为住房分配制度改得不够的占91.4%，认为人事调动制度改得不够的占89.8%，认为工资制度改得不够的占86.6%，认为干部选拔制度改得不够的占81.2%，认为公费医疗制度改得不够的占63.1%。

同时，对自己个人生活的各方面和社会上的各种现实状况表示不满的人中，也有不少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这些不满同各项现行制度联系起来。根据对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在个人生活上，对目前看病就医状况表示不满的人中，有40%的人是对公费医疗制度不满意；对物价不满的人中，53.3%的人认为物价政策不合理；对个人收入不满的人中，57.9%的人对工资制度不满意；对自己住房状况不满的人中，76.1%的人对住房分配制度不满意；对目前尚不能自由选择职业表示不满的人中，有56.3%的人是对现行的人事调动制度不满；在认为目前个人才能没能很好发挥的人中，有61.6%的人把不满指向干部选拔制度；认为现在自己社会地位降低了的人中，也有64.8%的人表示对干部选拔制度不满。在社会生活上，对现在的人才流动状况表示不满的人中，有67.1%的人对现行人事调动制度不满；而对目前政府工作效率、法制状况、党风状况表示不满的人中，多数人把不满集中在干部选拔制度上，分别为57.4%、57.3%和52.7%。

这种现象说明人们对改革的认识在深化，1987年7月在对2415人的调查中，53.4%的人认为要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相对“严惩党内贪官污吏”而言，更重要的是“改革干部制度”。人们开始要求改革深入到不合理制度的核心层次，尽快完成新旧体制的转换，这种要求还间接地表现在人们对以往改革的评价上，1987年5月调查，人们对以往改革的改革从9个方面进行评价时，把对改革是否深入的评价放在最后一位，综合评分最低，为4.519；1987

年10月调查,对改革是否深入的评价仍屈居最末,综合评分还有所降低,为4.460。

人们的不满和改革要求从现象层次深入到制度层次,使得一些曾经很有效的缓解人们不满情绪的措施和手段(如对短缺商品实行凭票供应、惩办几个贪官污吏、搞优质服务月、对不正之风实行突击大检查等)的作用越来越小,解决问题的难度加大。例如,面对人们对人才流动状况和不能自由选择职业的不满,单靠提高劳动人事部门的工作效率,改进工作态度,或举办几个人才交流会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可能刺激出更多的潜在流动意愿,加剧同旧体制的矛盾;问题的根本解决,有待于对现行劳动人事制度的彻底改革,通过一系列的劳动法规和政策建立起符合商品经济要求的新的劳动人事管理规则,使人们的流动意愿真正能够实现。而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对现行的企业制度、工资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实行配套改革,需要个人自由择业、企业自主择人的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形成,这显然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结束以前,人们的不满压力和改革要求将会始终存在。

当然,人们这种深入到制度层次的不满和改革要求也构成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之一,是改革进一步深化的社会心理基础。我们在分析前几年改革的社会心理环境时曾说过,只有抓住从群众不满中产生出来的改革机会,不失时机地、积极审慎地推进改革进程,才是缓解人们不满情绪的根本出路。这一点现在变得更急迫、更突出了。

3. 社会心理变动的频率加快、波动点增多

社会心理的一个最基本特点就是它的不稳定性,但这种不稳定却是有明显规律可循的:社会心理归根到底是要随着社会经济等客观环境的变动而变动的,这种变动特征在社会激烈变革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1987年初以来社会心理的变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首先,1987年初以来,社会心理变动的频率加快、幅度增大。在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出现了社会心理的第一个变动,不少人担心要搞政治运动,担心改革中断;当形势的发展使人们的这种担心打消以后,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物价上来。由于1987年物价上涨幅度较大,因而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出现了对物价的恐慌情绪,1987年5月调查,92.8%的人表示自己最担心的是“物价进一步上涨”,1987年10月调查,表示这种担心的人达94.5%,这是1987年社会心理的第二个变动;社会心理的三个变动是随着企业承包、租赁这一重大改革措施的推行,人们对生活保障的需求突然强烈起来,由于担心真的被端走铁饭碗(在传统体制下,城市居民以前没有这种担心),人们不约而同地突出这种需求,1987年5月和10月调查,这种需求都被排在各种需求的首位;社会心理的第四个变动是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后,人们普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心和出现新的改革期望,1987年7月调查,93.8%的人表示“当前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必要的”,多数人希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能够“消除不正之风”,“提高政府办事效率”,使自己“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并“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到1987年底,在部分大城市中人们的不满点又发生了一次有意思的变化:对北京、天津1152名家庭主妇所进行的关于猪肉凭票限量供应的反应调查表明,出于对猪肉价格上涨、供应紧缺的担忧和不满,多数人(68.1%)赞成对猪肉实行凭票限量供应,但这一措施实行以后,人们的不满又迅速地指向这一措施本身,52.8%的人抱怨实行猪肉凭票供应后“买肉难了”,更多的人(72.4%)抱怨“买瘦肉难了”,47%的人说自己每月吃的猪肉数量减少了,34.3%的人说每月用于买猪肉的钱比以前增多了,甚至有50.3%的人反映,实行票证后,肉店的服务态度也变差了。

1987年社会心理的这些变动，一是对改革深化的必然反应。例如，承包、租赁的推行是企业制度深刻的变革，会触动所有人的利益，不仅要触动改革后新增加的利益，还要触动原有的既得利益，因此，人们在心理上，行为上产生强烈的反应是必然的。改革越深入，社会心理的变动幅度也就会越大。二是以往改革措施的效果开始出现造成的。例如，1986年10月开始对新增劳动力实行合同工制度，当时并没有影响任何人直接的、实在的利益；而一年以后，已有不少的合同工合同期满，在签定新的劳动合同以前，不得不在家待业。再如，前几年的价格改革，使价值规律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使生产者能够根据市场信号来安排生产，但并不能立即使供给增加或减少，只有经过几个生产周期以后，才能使这种作用的结果显示出来。1987年蔬菜、猪肉供给不足，价格上涨，就是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这种由于以往改革开始显示效果、发挥作用而引起的社会心理波动今后会越来越多，把握起来也将越来越困难。

其次，1987年初以来社会心理变动的再一个特征就是变动的不一致性，波动点明显增多。1987年初以来，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更加明显，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在1987年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损伤，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87年有21%的城镇居民家庭由于物价上涨，实际收入水平下降，这明显不同于改革初期人们实际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状况；另外，由于人们在得到各种利益的多寡上，差距越来越大，因而在相当多的人中，产生了一种相对剥夺感——看到别人得多，自己得的少，觉得自己吃亏了、受损失了的感觉。这种利益分化使不同社会群体在不满、需求、情绪、行为倾向上，在对未来的担忧上，在对改革的评价上都出现了更大的差异和矛盾。在不满点上，1987年5月调查，工人在现行制度中最满意的是固定工制度（满意人数为71.7%，居各种职业之首）；对固定工制度最不满意的是单位负责人（不满人数为41.7%，在各种职业中不满人数比例最高），而单位负责人在现行制度中最满意的是合同工制度（满意人数为75.5%，在各种职业中居第一位）；各类专业人员、行政事业单位一般干部最不满的现行制度是干部选拔制度（不满人数分别为55.4%和50.4%），同时，有82.2%的专业人员、85.4%的一般干部把对这项制度不满的原因归结为“改得不够”，但在认为这项制度“改得过头了”的人中，单位负责人所占的比例最高（远高于其他职业，高出平均水平11.2%）；中小学教师中有60%的人最不满的是自己的住房状况，并有89.5%的人认为住房分配制度“改得不够”。1987年7月调查，我们选出工人、政府处级以上干部、大学生、离休干部和个体户五个职业阶层，来看他们对现行政治体制的不满差异。结果表明，工人在“走正常渠道办事难”上的不满情绪得分超出平均水平15.0%；在“干部以权谋私”一项上，离休干部的不满情绪得分比平均水平高29.7%，而处级以上干部的不满情绪得分却比平均水平低了15.8%；政府处级以上干部对“干部选拔任人唯亲”的不满情绪最高，高出平均水平2.4倍；对大学生来说，最不满的是“缺少公平竞争机会”，不满情绪得分高出平均水平107.9%；个体户最不满的是“政府办事手续太繁琐”，不满得分高出平均水平2.5倍。据根1987年5月的调查资料，在人们的各种需求上，工人、个体户、离退休人员、无职业者都把“有保障的生活”放在第一位；单位负责人、行政事业单位一般干部、各类专业人员和大学生都把“发挥才能、作出成绩”放在第一位；中小学教师的第一位需求则是“提高社会地位”，第二位需求是“改善住房条件”。在人们对未来的各种担心，除去对“物价进一步上涨”、“社会风气败坏”、“社会思想混乱”的担心程度不相上下以外，工人、中小学教师、离退休人员最担心的是“失去医疗、福利保障”；单位负责人、行政

事业单位一般干部、各类专业人员最担心的是“改革中断”，个体户最担心“个人失业”，无职业者最担心“富的越富，穷的越穷”。在对改革速度的评价上，工人在认为速度快了的人数上多于其他职业群体(占29.8%)，大学生却在认为速度慢了的人数上最高(占46.2)。

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这种差异和矛盾，已经并且将更强烈地在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上表现出来，社会心理的变动不再是同步的。由于人们通常以周围人作为直观的参照系，在利益格局的变动中，随时都会产生利益受损的感觉，爆发新的不满，随时都可能提出新的利益要求，因此，社会局部失稳和闹事的可能性增大了。面对这种情况，对改革的社会心理环境的系统调查研究，急需进一步改进和加强。

三、正确看待新时期的社会心理现象

把握了新阶段社会心理的特点，才能正确地分析、看待这一时期的各种社会心理现象。1987年初以来，出现了两个比较大的社会心理问题：在城市居民中普遍存在对物价上涨的心理恐慌和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存在着今后可能失去生活保障的担忧。

物价问题。1987年5月调查，对物价表示不满的人占79.9%，与1986年底相比较，认为物价状况变坏了的人占59.3%；相隔半年，1987年10月调查，对物价不满的人已达83.2%，与半年前相比，认为物价状况进一步变坏了的已达67.1%。两次调查还表明，绝大多数人(92.8%和94.5%)担心会发生“物价进一步上涨”。对这种普遍的物价恐慌情绪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但却不能把1987年出现的物价恐慌简单地看作是1985年物价恐慌的复制。对比分析表明，两次物价恐慌有三点明显的不同：第一，1985年的物价恐慌是在人们心理准备不足，对物价上涨的感觉阈限值很低的情况下产生的，那时人们对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特别是对改革也要付出代价这一点认识严重不足，而价格刚刚开始放开，人们对物价变动的感受性极强，尤其是对蔬菜、水果、肉类等副食品以及服务费用的价格变动更是敏感。价格上涨一、两分钱，往往就能引起人们的强烈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引发人们对物价上涨的恐慌心理是很自然的。而1987年的物价恐慌是在实行价格改革两年多以后出现的。这时，人们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已有所提高，而且也有了承担一定风险的思想准备。同时，随着价格改革的效果开始显现，价格逐步放开，不少过去靠国家补贴来压低销售价的商品，尤其是农副产品的价格在不断上涨，另外，还有不少小商品在价格规律的作用下，价格经常出现波动。在这种频繁的外界刺激下，人们的感受阈限值在渐渐升高，对物价变动的感受性开始降低，一、两分钱的价格波动已不大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了。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物价恐慌显然不再具有突发性和短期性，很有可能成为一种长期的、时断时续的社会现象。因此，不要指望通过某些措施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对物价上涨不满的社会心理问题。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第二，1985年的物价恐慌是在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自己生活水平受到很大影响的情况下发生的。根据当时的调查，实在价格改革后，大多数家庭不得不调整饮食结构，减少吃鱼吃肉的数量，增加吃蛋、吃菜的数量。为了维持已习惯了的食物消费水平，27.9%的人减少了用于穿用等方面的支出，27%的人放弃了原先准备购买耐用消费品的打算，甚至有20.6%的人减少了存款。近半数的人(45.6%)认为价格改革使自己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这种情况是由于工资调整没有与物价上涨“接口”造成的。而1987年的物价恐慌却是在大多数人对生活水平的主观评价仍然较高的情况下出现的(主观指标往往比实际收入水平、物价上涨指数等客观指标更有效地反映人们对自己生活水平的满意程度)。1987年5月调查，88.3%的人认为自己的

生活水平与1986年同期相比，没有下降或有所提高，1987年10月调查，持这种评价的仍占82.9%。显然，抽象地谈物价上涨，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的人会表示满意，但是，如果伴随物价上涨的是生产持续稳定地增长，是生活水平提高，是市场丰富，卖方市场转变到买方市场，则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是欢迎的。二次大战后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史证明了这一点。那么，我国现阶段人们一方面认为自己生活水平在提高，市场状况在好转（既使在对物价不满的人群中，仍有87.1%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受到影响或有所提高，76.3%的人认为市场供应状况变好了），一方面又普遍出现对物价的恐慌情绪，显然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由于对生活方式的不适应和接受了外界的恐慌情绪感染，这主要指那些生活水平提高得较快而同样产生物价恐慌心理的人（这类人占对物价不满人数的57.2%）。进行了这样的分析以后，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说，只要人们对生活水平和市场供应状况的主观评价不降低，就不会因为物价问题而产生社会动乱。第三，1985年对物价的恐慌情绪主要是通过人际传播渠道传递的，传播速度慢、范围有限。但在信息不清晰的情况下，容易造成以讹传讹和添油加醋，当时主要是在从众心理的作用下，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抢购和挤兑现象。而1987年的物价恐慌情绪却是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扩散的，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复制信息的能力极强，不仅能克服时空的障碍，广播、电视还能直接向文盲传播，因此，报纸、电视、广播都大谈物价，会使整个社会对物价问题的主观关注超过客观实际影响。但是，大众传播媒介直接向亿万受众传递信息，具有不易扭曲、可控性强的特点，结果是1987年普遍的物价恐慌情绪并没有带来盲目的抢购行为。这种变化也强烈地提出了进一步改进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当前的宣传工作中，应注意在物价问题上不要做过多的许诺，特别要防止人们对政府抑制物价的决心、行为和能力产生过高的预期。这种预期一旦形成，就有可能成为下一轮物价恐慌的诱发因素。

保障问题。1987年5月调查，人们把“有保障的生活”放在各种需求的第一位（综合评分2.705），1987年10月调查，保障需求仍居第一位，强度还有所增加（综合评分2.738），对这种需求较强的人达76.1%；同一调查表明，57.7%的人担心今后会“失去医疗、福利保障”，36.1%的人担心自己失业。而分职业统计，却有63.9%的工人、65.2%的商业服务人员担心失去医疗、福利保障，42.5%的工人、54%的商业服务人员担心失业，担心的人数比例远高于干部群体。这种情况表明，对未来生活保障的担忧已成为1987年初以来的一大社会心理问题，这种担忧更多地集中于工人群体。与物价恐慌问题存在的范围大、表现得清晰明显这些特点相比，保障担忧问题更具有隐蔽性、不易觉察和比较集中的特点，从长远看，对今后改革的社会心理环境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出现对未来生活保障的担忧，是改革深化的结果。如前所述，1987年多种形式的承包制、租赁制的推行，直接触动了整个企业制度、工资制度、劳动人事制度，预示着“打破大锅饭、端走铁饭碗”不再仅仅是一句口号，有可能很快成为现实。在这种客观条件下，人们心理上出现不安全感是必然的。这种不安全感也必然会促进我国低风险承受力、高依赖性的传统社会人格的改变。在几十年的大锅饭体制下，对我国城市居民特别是在职职工实行从头包到脚、从生包到死的政策，人们的安全感确实很高，但与这种安全感并存的，却是个人缺少进取心和冒险精神，整个经济生活缺少动力和活力。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现阶段人们心理上的不安全感未必是坏事，它有可能是我国社会心理结构和公民素质向符合商品经济生活的方向转化的开始。

但在近期内，却不能对这一重大的社会心理问题掉以轻心。首先，要抓紧对各项制度的配套改革，尽快在条文上和执行上完善已有的有关法规（如《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便从制度上保证人们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同时，根据目前对未来生活保障的担忧更多地集中在工人群体这个特点，要注意改革速度和顺序上的调整，在完善合同工制度、积极进行固定工制度改革的同时，要加快干部制度改革步伐，以使风险分散，加强全社会的公平感，从而避免工人群体和干部群体之间的攀比。

其次，目前人们对未来感到担忧，主要是因为这个未来的未知数太多，人们感到无法把握、无法预测，因而也无法制定自己预期内的行为对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担忧和恐慌心理，给改革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今后应进一步增加改革的透明度，在重大改革措施和各项方针政策上，对人们进行交底，这是减轻人们对未来的担忧、解社会情绪，短期内就能见效的手段，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改革的社会心理环境进入一个新阶段，社会心理对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时机、实施过程和效果都会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今后应该继续加强对社会心理的调查研究，正确分析新的社会心理现象，把社会心理条件作为改革决策的重要依据；并在重大改革的出台顺序、速度节奏的安排上，考虑如何使一项改革的实行能为下一项改革创造更加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从而保证持续的改革能够始终得到大多数公众的支持。

参加本报告讨论和数据整理的有：杨冠三、于得海、冯楚军、张 驰、姜 健。

执 笔：杨冠三

责任编辑：谭 深

《婚姻家庭大辞典》简介

我国第一部《婚姻家庭大辞典》，由山东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彭立荣同志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本大型的工具书，具有科学性、知识性、实用性、专门性、综合性相结合等特点，全书共150余万字，共设辞条4000余条。该书为山东省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和山东社会科学院1987年院重点研究项目之一。编者均系专业科研人员、大学教师和专业理论工作者。内容包括爱情、婚姻、家庭、婚姻家庭与人口、婚姻家庭与妇女、性科学、婚姻家庭心理、婚姻家庭伦理、婚姻家庭法律、中国历史上的婚姻家庭制度、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国外婚姻家庭、有关婚姻家庭的著作、有关婚姻家庭的社会组织和重要人物等方面，尽力吸收了国内外最新科研成果，对国内外婚姻家庭的最新状况均有反映。该书将于1988年国庆节前出版见书，全为精装本，热诚欢迎广大读者及有关单位积极订购。

《婚姻家庭大辞典》编委会